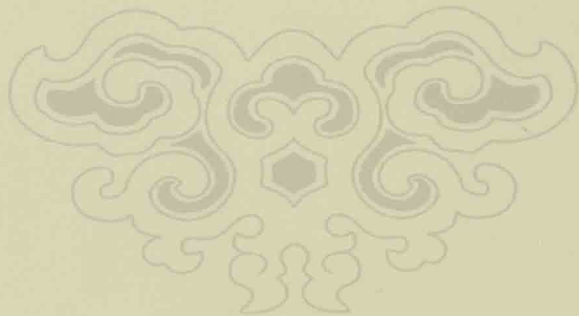




法門寺博物館論叢

(第一輯)

法門寺博物館建館二十周年學術討論會論文集

法門寺博物館 編

三秦出版社

法门寺博物馆 编

法门寺博物馆论丛

(第一辑)

法门寺博物馆建馆二十周年学术讨论会论文集

三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法门寺博物馆论丛 (第一辑) / 法门寺博物馆 编.
—西安: 三秦出版社, 2008. 10

ISBN 978 - 7 - 80736 - 474 - 0

I. 法… II. 法… III. 寺庙—博物馆—扶风县—文集
IV. G269.269 - 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160617 号

法门寺博物馆论丛 (第一辑)

法门寺博物馆 编

出版发行	三秦出版社
	新华书店经销
社 址	西安市北大街 147 号
电 话	(029) 87205106
邮政编码	710003
印 刷	西安市建明工贸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787 × 1092 1/16
印 张	27.5
插 页	20
字 数	450 千字
版 次	2008 年 10 月第 1 版
	2008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 - 2000
标准书号	ISBN 978 - 7 - 80736 - 474 - 0
定 价	68.00 元

辉煌中外 永现辉华的 法门寺地宫唐代文物（代序）

韩 伟

法门寺唐代地宫的发掘离我们越来越远了，可是它在人们心目中的分量却与日俱增，愈来愈重。这主要是因为 20 年来，法门寺博物馆作为陕西西线旅游的龙头单位，在建设文化强省及传承中华古老文明过程中，作出了卓越的贡献。一批意气风发、热爱法门寺文物考古工作的年轻人，经过 20 年的艰苦历练，取得了累累硕果。值此法门寺博物馆建馆 20 周年大庆之际，在全国人民通过各种形式隆重纪念改革开放 30 周年的喜庆气氛中，欣闻法门寺博物馆决定创办《法门寺博物馆论丛》，作为当年负责法门寺地宫考古发掘工作的当事人，我深切地感到，法门寺文物考古研究，已进入一个新的时代，诚如季羨林先生预言：“同敦煌学一样，研究法门寺文物，将成为一门国际性学科。”

法门寺位于陕西省扶风县法门镇，距西安 120 公里。据文献记载，法门寺创建于东汉桓、灵之间（公元 2 世纪中期），经北魏、北周而弘盛于唐代，为安置释迦牟尼真身指骨的著名寺院。

唐代曾多次开启法门寺的地宫供养佛骨。唐高宗、武则天女皇、中宗、肃宗、德宗、宪宗诸朝，均曾延请舍利于禁中。帝后侍奉香灯后，就送至京城各大寺院供人瞻礼。最后一次迎奉发生在懿、僖二宗之际，不仅重修了被武宗捣毁的地宫，而且赐赏了大量金银宝器及供养道具。

1981 年 8 月 24 日，法门寺明十三级真身宝塔，因历代地震及淫雨等原因，突然倒毁。此事在国内外佛教界引起很大震惊。一些国外佛教大德曾致电探询何日重建真身宝塔。陕西省政府于 1986 年作出了重建的决定。为配合这一工程，省、市、县三级考古文物部门抽调专人组成考古队，对塔基进行科学地发掘清理，陆续发现了明代环形基槽，以及唐代以青石砌边的方形夯土塔基。1987 年 4 月 3 日，考古队在塔基的正中部位，发现了唐懿宗李漼咸通十四年（873）建造的地宫后室之汉白玉藻井盖，揭开了当代中国考

古最辉煌的一页。

法门寺地宫总长为 21.12 米，总面积达到 31.48 平方米。由踏步漫道、平台、隧道、前室、中室、后室、秘龕七部分组成。从咸通十五年（874）正月初四封闭后，从未开启。地宫内所有文物均是 1113 年前放入的。因地震及塔体压力，地宫石顶及石壁破裂严重，地面铺石亦拱起，许多文物被砸损。长期漏水透气，其中有机质文物保存现状极差。除了中国文物保护专家在刚出土时进行了大量保护除霉工作外，大量的丝绸织物，目前正由德国专家着手揭取修复。

地宫中大批珍贵文物的出土，是唐代考古空前重大的发现。这批文物的显著特点是：高等级的文物多，佛教供养器多，新出现的器形多，器物上的璽文多，佛指舍利多，玻璃器皿多，秘色瓷多，丝绸织物多。尤其是在隧道中出土了《大唐咸通启送岐阳真身志文碑》及《监送真身使随真身供养道具及金银宝器衣物账碑》两通碑石，对了解地宫沿革、勘校文物名称及数量，具有重要意义。据统计，除佛骨外，出土金银器 121 件（组），琉璃器 20 件，珍珠宝石等 400 件（颗），瓷器 16 件，石质文物 12 件，漆木器、铁器、杂器 20 多件，大批丝织品待揭取整理后才可知其具体件数。

法门寺地宫发现四枚佛指舍利。佛是指释迦牟尼，佛骨在佛教经典中被称为舍利。释迦牟尼（前 565—前 485）80 岁那年圆寂。火化后，他的遗骨舍利被分成 8 份，为天竺 8 个国家建塔供养。公元前 3 世纪，阿育王把这些舍利塔打开，分送到世界各地供养。据《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二十三年“禁不得祠”，“不得”者，佛陀之天竺音译，则完全有可能在始皇时代传入佛之舍利。而印度本土在 13 世纪因伊斯兰势力进入，佛教基本消失，舍利保存情况不明，因之，法门寺这几枚佛指舍利就尤显得珍贵了。

地宫出土的通体华贵、富丽堂皇的金银器具，绝大部分是唐懿宗、唐僖宗供奉的。许多器物均以“五哥”划文或墨书题记标明物主，僖宗为懿宗第五男，在册立皇太子前宗室内以“五哥”相称，所以僖宗就是供养的许多器物的主人。全身以珍珠璎珞为装饰的捧真身菩萨，则是为祈求懿宗“圣寿万春”而铸造的。这些都是属皇帝所有的等级最高的唐代金银器物。

地宫出土数量众多的法器及供养道具。如盛放佛指舍利的各类棺椁宝函，还有包括灌顶、供香、供食、供花、燃灯的许多道具。其中以迎真身十二环锡杖最为重要，是国家重宝。

许多金银器是皇帝为迎送真身特别颁布敕令制造的，如卧龟莲花纹朵带环五足银熏炉底，璽刻有“咸通十五年文思院造八寸银金香炉一具并盘

及朵带环子，共重三百八十两。匠臣陈景夫、判官高品臣吴弘愬、使臣能顺”。这些璽文对研究唐代宫廷内金银作坊组织、职官设置、唐代晚期度量衡制度等方面，都提供了珍贵资料。

许多前所未有的新器形的出现，丰富了唐代金银器的种类。如僖宗供奉的蕾钮摩羯纹三足架盐台，金银丝结条笼子、飞鸿毬路纹银笼子、鎏金鸿雁纹茶槽子、鎏金团花银碯轴、鎏金飞天仙鹤壶门座茶罗子等等，使我们了解到唐代宗室贵族饮茶时所使用的调味器、烘烤器、碾茶器等用具，反映了唐代贵族生活及其风貌，是研究中国饮茶方法的极难得的珍品。

地宫中大量的琉璃器，在唐代比金银器价值要高贵得多。这些琉璃器上使用了刻花、贴花、印花、彩绘等独特的琉璃冷热加工工艺体系，是现存的古代伊斯兰琉璃中极为罕见的珍品。中外琉璃器皿研究的专家，通过对世界各地收集的伊斯兰刻花琉璃样品化学成分的测试，与法门寺器比较，大多认为法门寺的琉璃器其中大部分应属于9世纪以后伊斯兰琉璃重要的制造中心——伊朗内沙布尔。这批琉璃器入藏在公元874年，证明晚唐时期，中国与西亚仍有密切的贸易往来。

秘色瓷为唐懿宗所供奉，这被地宫内所出的《衣物账》碑所证实，给中国陶瓷史研究提供了一批可靠的标准器。从而使我们知道秘瓷釉色以青绿为主，也有微黄釉色的。个别器物在口沿或底足镶有银釦，使器物显得华贵，特别是以平脱手法装饰的花鸟团花纹瓷碗，更是海内绝品、瓷器中的稀世珍宝。这批秘瓷入藏于公元874年，可证实秘瓷烧制成功的年代还可上溯更早的时期。

据地宫《衣物账》记载，懿宗、僖宗、惠安皇太后、昭仪、晋国夫人等共供奉各类纺织品七百多件，地宫犹如一座唐代皇室纺织品宝库、织物品种有绢、锦、绫、纱、罗等等，仅绢类可达百种之多。刺绣品的加工手段有蹙金绣、蹙银绣、平绣、贴金绣、平绣加金筐、绣加绘等；印花方面有镂空版印花、凸版印花、描金印花、描金绘花等。数量众多的织金锦尤属存世最早的实物。捻金丝最细直径仅0.1毫米，每米3000转，说明金丝加工技术之高超卓绝，目前德国专家已揭取清理出一些衣物，鲜艳夺目，俨然如新，表现了唐代丝绸织造方面惊人的高度艺术水平。

自1987年春法门寺地宫考古发掘以来，学术界高度重视法门寺地宫文物的科学研究，关于法门寺文物考古与历史文化研究的论题与成果层出不穷。法门寺考古队及时发表法门寺发掘简报（《扶风法门寺塔唐代地宫发掘简报》，《文物》1988年第10期，《考古与文物》1988年第2期），出版

《法门寺地宫珍宝》（法门寺考古队石兴邦编选、韩伟解说，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1988年4月版，1989年3月版）。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和法门寺博物馆先后出版《法门寺》（张廷皓主编，陕西旅游出版社，1990年9月；法门寺博物馆主编，陕西旅游出版社，1994年），《中国考古文物之美10：佛门秘宝大唐遗珍——陕西扶风法门寺地宫》（陕西省考古研究所、法门寺博物馆编纂，文物出版社、光复书局企业有限公司，1994年12月），《法门寺文物丛书》（李新玲主编，长城出版社，2003年11月）等多种大、中型图录。这些图录的出版，为学术界研究法门寺文物提供了充分的考古资料。

20年来，法门寺博物馆共召开了近十次规模不等的国际性法门寺历史文物研究学术讨论会，出版了《首届国际法门寺历史文化学术研讨会论文选集》（张岂之、韩金科主编，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2年6月），《1992年国际法门寺佛教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人文杂志》1993年增刊），《'95越窑·秘色瓷学术讨论会论文集》（1995《文博》专号），《'98法门寺唐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韩金科主编，陕西人民出版社，2000年12月），法门寺博物馆对法门寺文物考古研究的深入开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20年间，省内外学术界出版了大批关于法门寺研究的学术著作。据不完全统计，自1988年以来，学术界共出版关于法门寺研究的专著近50种，发表论文、研究报告约380篇。如此众多论著以唐代文明和佛教文化为两大主轴，前者围绕法门寺地宫文物与唐文化研究（含金银器、琉璃器、秘色瓷、丝绸以及茶具茶文化等），涉及的研究领域涵盖唐代政治史、文化史、科技史、中外文化交流史等方面；后者围绕佛教文化，涉及的研究领域涵盖佛教史、佛教艺术、佛教哲学等方面。其中比较重要的有，陈景富《法门寺》、《法门寺史略》（三秦出版社，1988年4月；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0年7月）；柏明、张天杰等《法门寺与佛教文化》（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88年5月）；柏明、陈全方等《法门寺与佛教》（陕西旅游出版社，1990年7月）；梁福义《法门寺纪事》（陕西旅游出版社，1990年8月）；王瞻《法门涅槃》（香港天马图书有限公司，1993年8月）；梁子《唐宋茶道》（陕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11月）；李发良《法门寺志》（陕西人民出版社，1995年6月第一版，2000年1月第二版）；吴立民、韩金科《法门寺地宫唐密曼荼罗之研究》（中国佛教文化出版有限公司，1998年10月）；廖原、任新来《乾陵与法门寺》（陕西人民出版社，2002年9月）；李新玲《法门寺》（三秦出版社，2003年8月）；张高举《佛教圣地法门寺》（三秦出版社，2003年11月）；陕西省考古研究院、法门寺博物馆、宝鸡市文物

局、扶风县博物馆《法门寺考古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2007年4月）。法门寺文物考古研究的繁荣，无疑为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中国学术界注入了新鲜的活力。

回顾20年来的法门寺研究，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法门寺博物馆一批热爱文物考古事业的年轻同志，终于站立起来，成为法门寺文物考古研究工作的中坚力量！我衷心地希望他们在姜捷馆长的带领下，努力办好《法门寺博物馆论丛》，并通过《论丛》这个纽带，引入良好的学术规范，不断开拓法门寺文物考古研究的新天地，不断扩展学术队伍，不断推进法门寺文物考古研究的健康发展。

祝愿《法门寺博物馆论丛》越办越好！

祝愿法门寺文物考古研究不断取得新的更大成就！

2008年10月于北京

目 录

焜耀中外 永现辉华的法门寺地宫唐代文物（代序）	韩 伟（1）
唐法门寺塔及地宫沿革探讨	姜 捷 李发良（1）
法门寺：中国的大菩提寺	
——法门寺佛指骨舍利与玄奘大师的关系蠡测	陈景富（25）
法门寺历史分期新论	
——纪念法门寺地宫考古发掘 20 周年	赵 婧（41）
唐人崇敬佛祖“真身”的社会思潮	李斌城（51）
关于印度和中国的佛舍利庄严	奈良博物馆编著 王竞香 译（56）
略论武则天时期的舍利瘞埋	冉万里（64）
武则天与法门寺佛指舍利崇拜	张高举（76）
入唐求法：铸造新罗僧侣佛教人生的辉煌	拜根兴（84）
关于法门寺地宫密教文物及其内涵研究中的若干问题	吕建福（104）
西安西北唐初三阶教事探	
——从淳化金川湾石窟至昭陵澄心寺、扶风法门寺	张 总（135）
法门寺地宫八重舍利宝函的佛身表现	
——法身、报身、应身（提要）	白 文（146）
海外回归五代至宋佛舍利五重宝塔探微	文 军（148）
法门寺佛塔地宫鎏金银捧真身菩萨造像内涵及相关问题的探讨	
.....	张晓娟（159）
法门寺地宫金银器鑿文研究	李斌城（165）

法门寺地宫出土唐代纺织品的保护和研究

..... 张 静 路智勇 杨军昌 (182)

唐代捻金线技术初步研究及其学术价值

..... 杨军昌 姜 捷 路智勇 张 静 (190)

唐代玻璃及其西来东传 齐东方 (197)

关于汉唐熏香器（提要） 梁 子 谢 莉 (220)

从法门寺地宫出土的熏香器看唐代香文化的形成和发展 王竞香 (225)

法门寺《物账碑》记账方法浅析 杨水田 (234)

法门寺秘色瓷发现的重要意义 陆明华 (239)

千峰翠色 旷世奇珍

——法门寺唐塔地宫出土秘色瓷鉴赏 毛小东 (245)

法门寺与中西文化交流

——兼谈法门寺地宫申报丝绸之路跨国联合申遗之理由

..... 任新来 (253)

西安何家村唐代窖藏金银器上的墨书题记 韩建武 (267)

敦煌石窟中的佛寺 萧 默 (281)

唐代镂空刻花涂金银香球及其西传（提要） 阿卜杜拉·马文宽 (294)

从法门寺出土茶器看大唐宫廷煮茶程序

..... 姚国坤 程启坤 张莉颖 (296)

唐代的金银茶具及其鉴赏价值 李新玲 (310)

唐代饮茶与法门寺出土的茶具 (日) 高桥忠彦 王竞香译 (317)

中国茶艺的多元化 张莉颖 (324)

陆羽为代表的湖州茶人与中国茶文化 李新玲 陈文华 (328)

诗人原本是茶人 王建民 (339)

法门寺金代《香雪堂碑》试考 张恩贤 张晓娟 (341)

法门寺明《西蜀大洲居士书痴僧劝缘碣》略考 赵 婧 (347)

佛前神兽——琥珀狻猊 权 飞 (353)

浅谈揩齿布与唐人的揩齿保健 罗宏哲 (355)

西安发现玉本《三十六计》研究	刘卫东 (357)
法门珍宝 焜耀中外	
——法门寺博物馆文物外展工作回顾与思考	张高举 (376)
对讲解员发挥再创造能力的认识	刘 宁 (385)
浅议中小型博物馆的文物保护	刘慧芳 (389)
文物集中代管对馆藏文物保护的重要意义	任新来 (394)
探索与改造	
——浅谈法门寺博物馆文物库房改造的一点体会	张高举 (398)
浅谈传统鎏金工艺	刘慧芳 (404)
银器腐蚀原因浅析	刘慧芳 (407)
安全监控防盗报警系统工程防雷电保护	吕建乐 (410)
浅议基层博物馆的和谐之路	
——法门寺博物馆在和谐发展中突破	赵 辉 (415)
挑战与机遇：浅谈免费开放后博物馆的发展问题	韩恩平 (420)
《法门寺博物馆论丛》稿约	(426)

唐法门寺塔及地宫沿革探讨

姜 捷 李发良

一、唐贞观以前的法门寺塔及地宫

东汉至唐贞观五年，由“圣冢”形成为单层木塔，地宫尚未形成，舍利贮于石臼直接埋藏于塔基。

塔，梵文作 stupa，原意指古代印度安葬诸王显贵建造的覆钵式坟墓。公元前 483 年，释迦牟尼佛在拘尸国逝世后，为供养佛的遗骨舍利，波婆国、遮罗颇国、罗摩伽国、毗留提国、迦毗罗径国、毗舍离国及摩揭陀国举兵相争，最终以武力达成协议均分舍利，八国各起 stupa 供养之。于是，stupa 开始成为具有佛教纪念意义的建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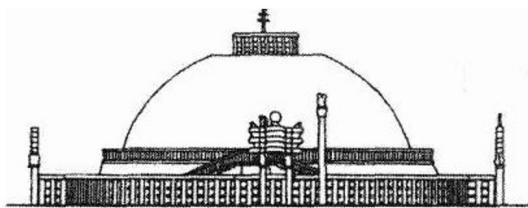
佛典记载，佛祖释迦牟尼逝后二百多年，有阿育王大举弘扬佛教，传说他又将佛的遗骨分葬于八万四千处建塔供养，同时，佛教徒又在释迦牟尼佛的出生地、成道地、初转法轮地、涅槃地以及当年曾经游历说法的地方建塔作为纪念。阿育王塔因此成为佛舍利塔寺的代名词。

汉、魏时期，随着佛教传入中国，“舍利东流”（道宣《震旦神州佛舍利感通序》），在各种灵异感应事迹包装下，阿育王塔寺纷纷出现在中国境内。

法门寺建自“西典东来”之时，由东汉到北周均称阿育王寺。唐代以前至东汉时期的法门寺塔，据唐大历张彧撰《大唐圣朝无忧王寺大圣真身宝塔碑铭》记载：“昔者汉□□□□齐梁鼎□遭时毁歇，晦迹丘墟，营□不□□□无□□祥异气往往间出，故风俗谓之圣冢焉。”^①

所谓“圣冢”，其实正是《魏书·释老志》所说的“天竺旧状”。《魏书·释老志》记载晋时洛阳佛塔：“凡宫塔制度，犹依天竺旧状而重构之，从一级至三、五、七、九。世人相承，谓之‘浮图’，或云‘佛图’。晋世，洛中佛图有四十二所也。”^②早期中国佛塔依“天竺旧状而重构之”，“天竺

旧状”，就是古印度覆钵式坟墓，与中国民间坟丘、墓冢形象相近（图一，印度桑奇大塔示意图）。



图一 印度桑奇大塔示意图

东汉至隋，法门寺的“圣冢”共经历了三次大的开发。第一次是北魏文成帝恢复佛教时有“太白二三沙门”“摄心住持”、“奉以身命”，经他们之手“验其铭曰育王所建，因以名焉”，阿育王寺（法门寺）成

为一方名寺。第二次发生在西魏恭帝二年（555），唐大历张彧撰《大唐圣朝无忧王寺大圣真身宝塔碑铭》云：“岐州牧小冢宰拓跋育以为□□□古名同于今□，削旧规，创新意，广以台殿，高其閤闾，度僧以资之，刻铭以纪之”；《大唐咸通启送岐阳真身志文碑》作“元魏二年岐守拓跋育初启塔基，肇申供养”。第三次乃隋文帝仁寿末岐州刺史李敏所为，唐大历张彧撰《大唐圣朝无忧王寺大圣真身宝塔碑铭》记其事云：“仁寿末，右内史李敏复修之，赓其铭矣。”《大唐咸通启送岐阳真身志文碑》作：“隋文时郡牧李敏……继开灵趾，咸荐香花”^③。由于史料缺乏，第二次拓跋育之“削旧规、创新意”及第三次李敏之“复修”作何形象，不得而知。

唐武德二年（619），秦王李世民奉诏为法门寺度僧八十。然而，由于隋末诸乡民众凭寺筑城以避战乱，唐初杂住失火，西魏拓跋育、隋李敏先后重修的法门寺塔遭受重创。

新兴的李唐王朝在贞观五年（631）首次开塔供养佛指舍利时，敕令岐州刺史张亮对法门寺塔进行了恢复重建。此次恢复重建，根据唐人的记载，主要是重建塔基之上的建筑。唐道宣律师《集神州三宝感通录》：“贞观五年（631），岐州刺史张亮，素有信向，来寺礼拜，但见古基曾无上覆，奏敕望云宫殿以盖塔基。下诏许之，因构塔上尊严相显。”^④唐大历张彧撰《大唐圣朝无忧王寺大圣真身宝塔碑铭》云：“贞观五年（631）二月十五日，岳伯张德亮曰‘睹神光，□□及物。’上章奏□动天有，□以望云□寝殿□施焉。”元和张仲素《佛骨碑》云：“太宗特建寺宇，加之重塔。”五代薛昌序《大唐秦王重修法门寺塔庙记》也同记此事：“文皇迁寝殿而修花塔。”^⑤

按照唐道宣律师的有关记载，直到高宗显庆年间唐皇室第二次迎佛骨时，法门寺塔下佛舍利的安奉竟极其简陋，佛舍利处于塔基下一丈余深处一石臼中。道宣麟德元年（664）撰《道宣律师感通录》宣律师感天侍传：“宣律师问：‘诸神自在，威力殊大。至如蜀川三塔，咸名大石，人有掘者，

莫测其源。至如秦川武功一塔，古者相传名曰育王。三十年中一度出现。贞观以来，两度出现。光瑞殊壮。而舍利如指骨，在石臼中。如何狭隘若此？’答曰：‘诸鬼神中贫富不定，各是往业，如人不殊，天中亦尔。随其所有而供养此塔云云’。”^⑥

道宣（595～667）律师曾于高宗显庆四年（659）奉敕亲赴法门寺迎礼佛骨，为皇室任命的行道高僧之一。“舍利如指骨”，“在石臼中”乃道宣奉命开塔时亲身经历。

法门寺用极其简陋“石臼”安奉佛舍利，可以说是中国古代佛舍利瘞埋制度史上仅见的一个特例。基于以下三条理由，我们认为，这个特例可能是比较魏、晋以后用宝瓶、石函安奉舍利的传统更早出现的一种舍利安奉方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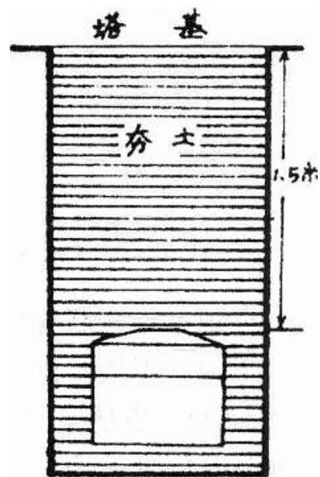
理由之一，据《魏书·释老志》载：“佛既谢世，香木焚尸，灵骨分碎，大小如粒，……胡言谓之‘舍利’。弟子收奉，置之宝瓶，竭香花，致敬慕，建宫宇，谓之‘塔’”。^⑦北魏时中国佛教界已经确立用宝瓶安奉舍利的传统。

理由之二，道宣所著另一部名著《集神州三宝感通录》，搜罗宏富，书中采集晋、宋至唐初神州大地有据可依的各处佛塔圣迹普遍采用宝瓶、石函或金、银、铜函安奉舍利。

理由之三，上世纪50年代以来中国境内经科学发掘的北魏到明清近40处舍利塔基考古资料证明：最早从北魏开始，各地舍利塔基已普遍采用石函、盩顶石函和舍利瓶安奉舍利，如河北定县北魏兴安二年（453）石函、北魏太和五年舍利石函，而且都有一定数量的钱币或金、银、琉璃等七宝类供养品随葬；隋代则开始采用鍍金铜盩宝函、铜质函盒以及精致的石函安奉舍利，随葬供养器物更多^⑧。

既然显庆年间开塔时“舍利如指骨”仍“在石臼中”，简陋到如此地步，可以知道贞观五年张亮修塔时，塔基之下一仍其旧，没有安奉佛舍利的石室，舍利石臼直接埋在塔基下一丈余深处夯土中。

见诸报道的考古资料证明，北魏时期采用宝瓶、石函安奉舍利的塔基普遍没有地宫石室，舍利石函直接埋入塔基夯土中（图二，北魏定县塔下石函安



图二 北魏河北定县舍利塔基石函安放示意图

放示意图)。

关于唐贞观五年岐州刺史张亮重修之法门寺塔的形制。从前述“但见古基曾无上覆，奏敕望云宫殿以盖塔基”，“加之重塔”，以及道宣律师《集神州三宝感通录》记显庆年间重修宝塔寺僧以塔上“旧材多杂朽故，遂总换以柏”，可以推知贞观五年张亮重修之塔为单层木塔。

又据《集神州三宝感通录》，高宗“显庆四年九月，琮即入塔内，专精苦到，行道久之，未有光现。至十日三更，乃臂上安炭，就而烧香，懔励专注，曾无异想。忽闻塔内像下震裂之声，往观乃见瑞光流溢，霏霏上涌。塔内三像足各各放光，赤白绿色缠绕而上，至于衡桷，合成帐盖。琮大喜，踊，将欲召僧，乃睹塔内罅塞，僧徒合掌而立，谓是同寺”^⑨。可见单层木塔内有相当大的空间作佛事活动。



1

图三 1. 汉白玉阿育王塔



2

2. 鎏金铜浮图

贞观五年法门寺单层木塔的形制，可以从地宫前室出土安奉佛指舍利的汉白玉阿育王塔及其内部鎏金铜浮图得到佐证。鎏金铜浮图造型精制，通高53.5厘米，塔基平面为方形，塔基三重均设勾栏，上层作须弥座形式，束腰部分壶门处透空。各层塔基上下于各面正中设拱桥形飞梯，桥头立二望柱，柱顶蹲兽。塔身面阔、进深均为三间，当心间设双扇门，门中部有插杠，门外置金刚力士一对。顶似“攒尖顶”，柱头斗拱、补间人字拱、攀间枋、栏额、蜀柱俱全。塔顶表现出筒板瓦屋面及屋脊端头三叠翘头筒瓦的形式。塔顶中心置覆莲、宝匣、覆钵、六盘相轮及刹顶宝珠等。这种面阔三间的方形单层木塔在敦煌盛唐壁画中多有出现，应该也是比较接近唐初法门寺塔

的造型（图三，地宫出土汉白玉阿育王塔及鍍金铜浮图）。

二、唐法门寺四层木塔及地宫建造年代探讨

唐高宗显庆四年（659）至龙朔二年（662），按照“三十年一开”的传统，唐王朝如期举行第二次迎佛骨盛典，法门寺真身宝塔由贞观五年的单层木塔改建成四层木塔，并在塔下首次修筑安奉佛指舍利的石室，按照帝王陵墓的规格建成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塔下地宫。

唐高宗显庆四年（659）九月，距贞观五年（631）第一次开塔示现佛舍利将满30年，开启法门寺塔供奉佛骨事再度列入唐王朝的议事日程。

根据道宣律师《集神州三宝感通录》记述，唐高宗朝开塔供奉舍利不同于贞观五年由地方官岐州刺史主持其事，而是唐高宗李治直接部署内道场僧实施。高宗朝此次援引贞观五年旧例开塔供养佛骨，标志着“三十年一开”正式确立为有唐一代国家祭祀的基本制度。

高宗朝此次开塔供养佛骨，正值唐王朝经历“贞观之治”以后步入盛世的重要发展阶段。经济社会的持续发展、政治文化的稳定繁荣以及整体国力的逐步强盛，使得此次有皇权政治强力介入的开塔供养盛举有可能完成对法门寺塔、地宫进行历史上最大规模的改制。经过此次改制，法门寺塔及地宫一举成为中国佛舍利安奉制度至尊等级的象征。

高宗朝开塔供奉法门寺佛骨舍利，自显庆四年（659）九月至龙朔二年（662）二月历时三年之久。

道宣《集神州三宝感通录》载：

显庆四年九月，内山僧智琮、弘静见追入内，语及育王塔事年岁久远，须假弘护。上曰：“岂非童子施土之育王耶？若近有之，则八万四千之一塔矣。”琮曰：“未详虚实。古老传云名育王寺，言不应虚。又传云三十年一度出，前贞观初已曾出现，大有感应。今期已满，请更出之。”上曰：“能得舍利，深是善因。可前至塔所，七日行道，祈请有瑞，乃可开发”。即给钱五千、绢五十匹以充供养。琮与给使王长信等十月五日从京旦发，六日逼夜方到。琮即入塔内，专精苦到，行道久之，未有光现。至十日三更，……忽闻塔内像下震裂之声，往观乃见瑞光流溢，霏霏上涌。塔内三像足各各放光，赤白绿色缠绕而上，至于衡楠，合成帐盖。琮大喜，即召来使同睹瑞相。……

琮等以所感瑞具状上闻。敕使常侍王君德等送绢三千匹，令造朕等

身阿育王像，余者修补故塔。仍以像在塔，可即开发出佛舍利以开福慧。僧以旧材多杂朽故，遂总换以柏，编石为基，庄严仑奐，制置殊丽。……

初开塔日，二十余人同共下凿，及获舍利，诸人并见。其舍利，形状如小指初骨，长寸二分，内孔正方，外楞亦尔，下平上圆，内外光净。余内小指於孔中，恰受。便得胜戴以示大众，至于光相变现，不可常准。于时京邑内外道俗连接二百里间，往来相庆，皆称佛德一代光华。……

显庆五年春三月，下敕取舍利往东都入内供养。时周又献佛顶骨至京师。人或见者高五寸、阔四寸许，黄紫色。将往东都驾所，时又追京师僧七人往东都入内行道。敕以舍利及顶骨出示行道僧，曰此佛真身，僧等可顶戴供养。经一宿，还收入内。皇后舍所寝衣帐直绢一千匹为舍利造金棺银椁，数有九重，雕镂穷奇。以龙朔二年送还本塔。至二月十五日奉令僧智琮、弘静京师诸僧与塔寺僧及官人等无数千人共藏舍利子石室掩之。^⑩

其中，道宣所记高宗朝重修法门寺塔：“敕使常侍王君德等送绢三千匹，令造朕等身阿育王像，余者修补故塔。……僧以旧材多杂朽故，遂总换以柏，编石为基，庄严仑奐，制置殊丽”。大历张彧撰《大唐圣朝无忧王寺大圣真身宝塔碑铭》作：“□绢□□五百匹□□□复益令增修。有禅师惠恭意方等遵睿旨购宏材，征宇县之工，写蓬台之妙，咨□匠而藏制，献全摹以运斤，不日不月，载营载葺，且□□□谷□隈□□□□□襟带八川□□山之□□□□隐□□面太白之群峰，阳乌矫其翅，由是危檻对植，曲房分起，栌栳叠拱，枕坤轴以盘郁。梁栋攒罗，拓乾冈而抱斗适将□会□□□□□宗师□□佛之记□域中之□□最上之因，岂□□乃瓌琦蓄□丰丽穹崇岳，立杖一柱以戴天。蜿蜒霞舒，揭万楹而捧日”^⑪。此外，1987年法门寺考古发掘清理塔基时出土有永昌元年（689）《法门寺惠恭大德之碑》、《慧恭禅师支提之塔铭》，前者也有“显庆首年施绢三千匹修营塔庙”的记载。禅师惠恭，即《慧恭禅师支提之塔铭》所载之“大唐岐州岐阳县法门寺检校佛塔大德禅师慧恭”，据《法门寺惠恭大德之碑》，唐初人，俗姓韦，山东邹县人。十四岁从慈门寺道场审禅师入道，二十三岁居法门寺，供养灵塔。贞观末，沐浴舍利并烧二指供养。显庆中，高宗施绢三千修营塔庙，奉敕主持修造，尊称检校佛塔大德禅师^⑫。

关于舍利形状，“其舍利，形状如小指初骨，长寸二分，内孔正方，外